

吹出一个“股剩客栈”

□林鹏(一扔就涨)

2007年春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,被股市折磨了十年亏了九成的我,突然决定吹一个“牛”。虽然本人生平吹牛无数,但当时也没想到那个牛皮竟然最后吹成那么大,大到四年后的今天,我的生活还被那个牛皮所影响着。

刚吃完午饭,是四块一份的盒饭,我对自己太残忍了。因为昨晚临睡前我突然做出一个非常悲壮的决定,以后我的伙食必须与股票的走势成正比……”

一篇《2007,与众菜鸟们共战股海!》就这样开始在百度股票贴吧登场,署名:一扔就涨。每天吃完晚饭,我就固定上网吹牛,没想到一天天过去,捧场的人越来越多,直到后来搞得几乎所有的财经论坛都在同步直播,弄得满城风雨。

这下坏了,压力太大了,一停吹就要被世人授以光荣的“太监”称号。所谓头可断,血可流,饿死事小,失节事大,从此不管刮风下雨,感冒发烧,我都不敢旷工偷懒。

这个超级大型的牛皮,一时也惊动了许多财经媒体争相报道。谁也不知道这个帖子的背后,到底是哪根“葱”。就这样坚持吹了三个月,我终于将帖子结束,这个大牛皮竟然最后整理成股市小说——《股剩是怎样炼成的》,出版发行了。

原本以为,这仅是我漫长股市人生中的一段插曲,一阵喧嚣之后,我依然上我的班,炒我的股票,写我的博客。

可是,我的生命里却因此突然多了一大群人。帖子连载的三个月,正是这些因帖而来的股友网友们自发形成的群体,不断地支持我,才让我坚持写到最后。我给他们起了个名字,叫“炒饭”(FANS)。

帖子结束了,这些曾经的支持者却不离不弃,怎么都赶不走了。大家建立了很多个群,每天聊股票,聊人生,吹牛,八卦,乐此不疲,甚至还筹建了个股剩希望工程基金,专用于资助灾区贫困学生。

一晃四年,一次无意的冲动,不仅改变了我的生命,同样也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。陆陆续续,不断有人加入,这个“炒饭”大家庭越来越庞大。其中,有怀旧的,有满怀希望的,有高手,有菜鸟,有成功的,也有破产的,有南地北的人有因此喜结良缘的,有因此成为莫逆之交的。每个人在他的股市人生中,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,而加入了这个大家庭后,又一起谱写着一个新的故事。

我生活在厦门,大家在相识相交三年后,决定把厦门作为第一次聚会的地点。

2010年5月,各地的“炒饭”相约在厦门海边聚会,大家把酒言欢,海喝狂欢,述说着各自股市中的悲欢和体会,回忆着这几年大家一起走过的日子。

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,大家无奈挥手告别,相约明年再聚厦门。

或者是相逢的喜悦和散场的不舍反差实在太大,大家决定在厦门海边,建一座股剩客栈,作为每年的聚会之用,接待各地来厦门游玩的股友。

经过大家三个多月的努力,在厦门美丽的环岛路海边,一幢前看海,后靠山,天下独一无二的以股市为主题的客栈,终于新鲜出炉了。

手绘的大盘二十年K线图,从客栈一楼沿着楼梯一直挂到四楼,每一次上楼看到,都是那样触目惊心,似乎能从一个根K线中清晰地看到明天的自己,感受当时的心情。

每间客房都以不同投资家的名字命名,从杰西·利弗莫尔到彼得·林奇、巴菲特,相应地,房间内,放置着他们的简介和著作。

二楼客厅,两端的书架上,摆满了大家捐赠的股票书,很多书上密密麻麻的写着曾经的主人阅读时的心得体会,似乎也记载着每个人的股市故事。

有一个,曾因炒股破产,家庭离异,最后又在股市中东山再起,拿回了曾经失去的一切。

有一个,曾经三度爆仓,最后找到了不败的秘诀,总结出属于他自己的理论。

有一个,在他亏光家里所有钱的那天中午,不动声色地回家吃饭,而他的夫人一无所知。一年后,十年一遇的大牛市,他又连本带利地杀了回来。

有一个,只看《人民日报》做股票,党怎么说,他就怎么做,从不失手。

还有一个我,十年炒股亏了九成,一买就跌,一扔就涨,最后却因吹牛而扬名立万于股市。

有的人由幸福在股市中变成了不幸,有的人不幸,却在股市中找到了幸福。这是一个凝聚太多人梦想,也同样让太多人梦醒的地方。

股剩是什么?股市中剩下的那些人。客栈的每个角落,都挂着股市中的经典笑话和搞笑图片,不定期更新着。在股海中沉沉浮浮,每个人几乎失去了自己,为何不开怀一笑呢?

如果你在客栈吃饭时,盘里的青菜只有一根,不好意思,因为它的菜名叫“一字涨停”。如果给你上的鱼,没有了鱼头和鱼尾,别怪厨师偷吃了,不好意思,因为它的菜名就叫“投资哲学”。

天台,我们又特意搭了一个观海阁,为每次聚会谈股论经的最佳场所。观海阁边立着一面墙,每个来过客栈的股友,离开时都要写下一句。他对股市的最终理解或者最深的希望,钉在墙上,号称“股剩遗书”。

天台还有一面思过墙,挂满了大盘每次重要底部或者顶部当天的分时图,每每看着这些,心中便难以抑制的感慨和伤感。

起起落落,来来往往,股市是什么,人生又是什么?我也一直没有停止过追问。我在股市中得到了什么,又失去了什么?如果没有股市,我的人生又会是怎样?

远远看到那一幢白色的房子,走近了便看到门上那块招牌:股剩客栈。

再到跟前,只见门上上联:股市就像一条河,下联:人生就像一条狗。

我从美国来

——参加上交所开业典礼所遇所感

□邱晓



在上海市时,受汪道涵(左起第四位)接见。

20年前的中国,证券业还是一张白纸,而如今的证券业已是红红火火。当年有多少人能料到这块金融贫瘠的土壤,竟能孕育出这唯五彩斑斓的繁花?这也让我忆起20年前的冬天,我代表美林证券,应邀前往只有8只股票交易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席开业典礼的往事。当时的中国已经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,许多人开始接触西方的东西,对股票充满好奇。但中国人在华尔街做股票经理的极少,所以,我一回国,就成了众人争相取经的对象。

封与开:股市40年大变迁

上海证券交易所坐落在黄浦江附近的黄浦路15号,是一幢欧式建筑。尉文渊总经理在百忙中单独在办公室接见了,我介绍了交易所的情况。几年后,我出差到纽约,还联络到他的。我问,你还记得我?他说,怎么会忘记呢,你是第一位从美国来我交易所访问的代

表。尔后,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委员会主任、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(那次回国就是他和另外两位副主任发来的邀请函),在交通银行接见了,我讲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建的前前后后,讨论了上交所的经营和发展,并和我探讨了B股的发行问题。说是打算六个月后B股上市,问我的意见如何。

我直言不讳地说,一个公司的经营和利润只有一个,而在同一个市场上使用两种货币来交易两种股票,这将产生两种供求关系,结果会产生两种不同的价值。这在理论上不通,在运作中也不好实行,而且还可能引起外汇市场混乱。他说,我们需要外资,但又不能让外资和我们在同一个市场上操作,否则,我们的老百姓会吃亏。我们创造一个B股市场,让大鼻子和I大鼻子去炒,盈亏在他们之间。我走后半年,B股果然开市。今天来看,B股的历史作用快要完结了。如今,中国已经拥有丰厚的外汇储备,

不再像20年前那样两眼紧盯外交所。又有车来接我们,说是去市府,我已经不再感到惊奇了。那天见了汪道涵和他的顾问们。汪道涵给我的印象是他很健谈,很喜欢讨论经济理论,和我侃侃而谈经济和市场的机制,希望我有空多回来聊聊。临走时他还半开玩笑地说,40年前,部队包围了上海股票交易所,你父亲参与封闭了这个交易所,40年后,儿子从美国回来庆祝新交易所的开业,真是一代人的变迁啊!我父亲表示确实如此。这一来,我心里更有底了——原来,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允许和市场经济结合。

又回到了广州,广东人的盛情让人难忘。这次上了白云山。制衡”的大门口挂着热烈欢迎的大红横幅,市领导厂领导们都到门口迎接。研讨会是在市体改委主持下进行的。那时的人对新事物充满渴望,上印象深刻。交流中,许多人表露出强烈的愿望,希望也能在广州成立股票交易所。



与上海证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尉文渊(左)会谈。



在交通银行总部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委员会主任、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(中)及其助手们讨论股市的建立和发展问题。

尔后,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委员会主任、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(那次回国就是他和另外两位副主任发来的邀请函),在交通银行接见了,我讲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建的前前后后,讨论了上交所的经营和发展,并和我探讨了B股的发行问题。说是打算六个月后B股上市,问我的意见如何。

我直言不讳地说,一个公司的经营和利润只有一个,而在同一个市场上使用两种货币来交易两种股票,这将产生两种供求关系,结果会产生两种不同的价值。这在理论上不通,在运作中也不好实行,而且还可能引起外汇市场混乱。他说,我们需要外资,但又不能让外资和我们在同一个市场上操作,否则,我们的老百姓会吃亏。我们创造一个B股市场,让大鼻子和I大鼻子去炒,盈亏在他们之间。我走后半年,B股果然开市。今天来看,B股的历史作用快要完结了。如今,中国已经拥有丰厚的外汇储备,

不再像20年前那样两眼紧盯外交所。又有车来接我们,说是去市府,我已经不再感到惊奇了。那天见了汪道涵和他的顾问们。汪道涵给我的印象是他很健谈,很喜欢讨论经济理论,和我侃侃而谈经济和市场的机制,希望我有空多回来聊聊。临走时他还半开玩笑地说,40年前,部队包围了上海股票交易所,你父亲参与封闭了这个交易所,40年后,儿子从美国回来庆祝新交易所的开业,真是一代人的变迁啊!我父亲表示确实如此。这一来,我心里更有底了——原来,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允许和市场经济结合。

又回到了广州,广东人的盛情让人难忘。这次上了白云山。制衡”的大门口挂着热烈欢迎的大红横幅,市领导厂领导们都到门口迎接。研讨会是在市体改委主持下进行的。那时的人对新事物充满渴望,上印象深刻。交流中,许多人表露出强烈的愿望,希望也能在广州成立股票交易所。

自那以后,父亲只要有精神就跑股市,去散户厅跟人聊天,每天都

不再像20年前那样两眼紧盯外交所。又有车来接我们,说是去市府,我已经不再感到惊奇了。那天见了汪道涵和他的顾问们。汪道涵给我的印象是他很健谈,很喜欢讨论经济理论,和我侃侃而谈经济和市场的机制,希望我有空多回来聊聊。临走时他还半开玩笑地说,40年前,部队包围了上海股票交易所,你父亲参与封闭了这个交易所,40年后,儿子从美国回来庆祝新交易所的开业,真是一代人的变迁啊!我父亲表示确实如此。这一来,我心里更有底了——原来,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允许和市场经济结合。

又回到了广州,广东人的盛情让人难忘。这次上了白云山。制衡”的大门口挂着热烈欢迎的大红横幅,市领导厂领导们都到门口迎接。研讨会是在市体改委主持下进行的。那时的人对新事物充满渴望,上印象深刻。交流中,许多人表露出强烈的愿望,希望也能在广州成立股票交易所。

自那以后,父亲只要有精神就跑股市,去散户厅跟人聊天,每天都

自那以后,父亲只要有精神就跑股市,去散户厅跟人聊天,每天都

自那以后,父亲只要有精神就跑股市,去散户厅跟人聊天,每天都

冷变热:新兴市场扬帆起航

最后一站是深圳。由深圳证券交易所、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信托投资公司联合举办讲习班,由我给金融业几十位专家介绍国际证券市场行情、操作和管理。讲座由禹国刚(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)主持,他不时和会场中一位白发老人用日语对话。后来听说,他是留日回来的,在日本取得证券经纪人执照。那位白发老人也是从日本回来的,以前曾是民国时期上海股票交易所的一位经纪人。当时我对深圳的印象是越来越接近香港,居民人口都是各地移民,各种方言都有,高学历者比比皆是。

中午和几个单位的老总一起吃饭,王健(深圳发展银行董事长)介绍了股票发行的曲折经历。由于股票还是新事物,市民们不懂,因此发行难度很大,深圳发展银行作为第一批在深圳上市的五家公司之一,无人问津。他说,我这个董事长成了推销员,整天在外面介绍股票。后来没办法,就去见了市委书记李灏,反映情况。李书记当即解囊,拿了自己的钱买了他的股票,并发文要求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带头买股票,支持股份制改革,这样一来局面就打开了。以后深发展的股票飞涨,人们才开始懂得股票的价值。

晚上,李灏带了随员来酒店看我们。说起证券交易所,他对我说,你给他们好好讲讲美国的办法和规矩。人家怎么搞的,让他们好好学学。

第二天,禹国刚带我们去参观深交所。一走进大门,大理石的迎风壁上盖着一块大红布。他伸手揭开那块红布,露出几个烫金的大字——深圳股票交易所。他笑着说,我们就等着中央批示一来,就把这块布拿掉。走进大厅,里面已经在交易中。交易厅不大,墙壁上全是大屏幕,几个人坐在屏幕前看盘,五只股票在交易中。

后来,我们又参观了一家证券公司。营业厅的门外,坐着一些股民,和他们聊起来才知道,他们早上五点,天不亮就来排队拿号买原始股,说是拿不到前五个号就不可能买到股票。这和早先王健推销深圳发展的原始股情况已经全然不同了,股民已经懂得股票的机会。我不由得想起上世纪60年代,想要买只鸡,也要起早摸黑,冒着凛冽的寒风,到菜市场门口去拿号排队。

大楼的天井中还挂着一条醒目的标语,上面写着,严厉打击场外非法交易。为什么股票还有场外交易?走进营业厅,看到墙上贴着一张布告说:今后股票每户出售最多不得超过1000股。一位证券公司的领导说,几天前,这里也贴过一张布告,每户购买股票最多不得超过1000股。难怪会出现股票场外交易,原来是流通有限制。今天,中国的证券市场规模和流通状况已经远远不同于20年前了。虽然它还是一个新兴市场,但已经不是市场的新兴。

回到纽约,美林集团国际部汉瑞森主任高兴地说,我们正等着听你在中国的故事呢。当我一一作了介绍后,我发表了自己的观点,建议公司在中國建立机构,开始投资,拓展业务。他们非常兴奋,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中国的资本市场已经兴起,所以表示要认真研究开拓中国的业务。

关心着股市的涨跌,似乎天天担心着银行倒闭的可能性。我每次回家就和父亲讨论股市,讨论中国经济、讨论改革开放。将近20年,因为证券市场,我们父子间说了许许多多的话,彼此也渐渐地走近了,不再有陌生和隔阂。

去年父亲走得很突然,他的人生似乎一下子被打到了跌停板,随即摘牌退市了。弥留之际,有一次父亲猛然意识清醒地问:现在几点啦?“两点半。”母亲在边上说。父亲一个劲摇头,我明白了,看了看手机回答:突破3000点了。”“上仆通道。”这是父亲留下的最后一句话。整理父亲遗物时,发现了他的股票账户,里面只有2000股工商银行股票,成本价在4元出头,估计是用自己积攒的零花钱买的。今年清明我第一次去扫父亲的墓,我告诉他,股票解套了。同时也谢谢他,陪我走过近20年的股市经历。对于同是在计划体制下长大的父亲和我,20年的资本市场使我们成了“同学”,除了养育之恩,父亲又给了我“同学”情谊。

“同学”,除了养育之恩,父亲又给了我“同学”情谊。

股市让我和父亲成了“同学”

股票如同博彩,必须天不亮就去证券公司门口排队拿号,拿了编号经过两三次点名,才能领取委托单,委托进去就石沉大海,一天也没成交易,彼此有些陌生和隔阂。父亲性格固执,上世纪80年代商业开放,他蔑视为投机倒把,直到商品丰富了,买东西也不用凭啥票了,才肯承认商业开放是好事。对股票,他开始也固执地认为与彩票没啥区别,那是赌博。当时我对股票也一窍不通,不过没有“赶紧扔掉”,反而兴致勃勃地加入了炒股大军。

但我和父亲关于股票的“争吵”随即展开。父亲反对搞股份制,“一搞股份制,股东就成了老板,工人阶级都成了打工仔,这像话吗?”嘴上愤愤不平,可我想买股票,父亲还是早早地起床叫醒我,让我去排队。1991年股价放开前,要买到

股票如同博彩,必须天不亮就去证券公司门口排队拿号,拿了编号经过两三次点名,才能领取委托单,委托进去就石沉大海,一天也没成交易,彼此有些陌生和隔阂。父亲性格固执,上世纪80年代商业开放,他蔑视为投机倒把,直到商品丰富了,买东西也不用凭啥票了,才肯承认商业开放是好事。对股票,他开始也固执地认为与彩票没啥区别,那是赌博。当时我对股票也一窍不通,不过没有“赶紧扔掉”,反而兴致勃勃地加入了炒股大军。

但我和父亲关于股票的“争吵”随即展开。父亲反对搞股份制,“一搞股份制,股东就成了老板,工人阶级都成了打工仔,这像话吗?”嘴上愤愤不平,可我想买股票,父亲还是早早地起床叫醒我,让我去排队。1991年股价放开前,要买到

股票如同博彩,必须天不亮就去证券公司门口排队拿号,拿了编号经过两三次点名,才能领取委托单,委托进去就石沉大海,一天也没成交易,彼此有些陌生和隔阂。父亲性格固执,上世纪80年代商业开放,他蔑视为投机倒把,直到商品丰富了,买东西也不用凭啥票了,才肯承认商业开放是好事。对股票,他开始也固执地认为与彩票没啥区别,那是赌博。当时我对股票也一窍不通,不过没有“赶紧扔掉”,反而兴致勃勃地加入了炒股大军。

但我和父亲关于股票的“争吵”随即展开。父亲反对搞股份制,“一搞股份制,股东就成了老板,工人阶级都成了打工仔,这像话吗?”嘴上愤愤不平,可我想买股票,父亲还是早早地起床叫醒我,让我去排队。1991年股价放开前,要买到

股票如同博彩,必须天不亮就去证券公司门口排队拿号,拿了编号经过两三次点名,才能领取委托单,委托进去就石沉大海,一天也没成交易,彼此有些陌生和隔阂。父亲性格固执,上世纪80年代商业开放,他蔑视为投机倒把,直到商品丰富了,买东西也不用凭啥票了,才肯承认商业开放是好事。对股票,他开始也固执地认为与彩票没啥区别,那是赌博。当时我对股票也一窍不通,不过没有“赶紧扔掉”,反而兴致勃勃地加入了炒股大军。

但我和父亲关于股票的“争吵”随即展开。父亲反对搞股份制,“一搞股份制,股东就成了老板,工人阶级都成了打工仔,这像话吗?”嘴上愤愤不平,可我想买股票,父亲还是早早地起床叫醒我,让我去排队。1991年股价放开前,要买到

股票如同博彩,必须天不亮就去证券公司门口排队拿号,拿了编号经过两三次点名,才能领取委托单,委托进去就石沉大海,一天也没成交易,彼此有些陌生和隔阂。父亲性格固执,上世纪80年代商业开放,他蔑视为投机倒把,直到商品丰富了,买东西也不用凭啥票了,才肯承认商业开放是好事。对股票,他开始也固执地认为与彩票没啥区别,那是赌博。当时我对股票也一窍不通,不过没有“赶紧扔掉”,反而兴致勃勃地加入了炒股大军。

但我和父亲关于股票的“争吵”随即展开。父亲反对搞股份制,“一搞股份制,股东就成了老板,工人阶级都成了打工仔,这像话吗?”嘴上愤愤不平,可我想买股票,父亲还是早早地起床叫醒我,让我去排队。1991年股价放开前,要买到

股票如同博彩,必须天不亮就去证券公司门口排队拿号,拿了编号经过两三次点名,才能领取委托单,委托进去就石沉大海,一天也没成交易,彼此有些陌生和隔阂。父亲性格固执,上世纪80年代商业开放,他蔑视为投机倒把,直到商品丰富了,买东西也不用凭啥票了,才肯承认商业开放是好事。对股票,他开始也固执地认为与彩票没啥区别,那是赌博。当时我对股票也一窍不通,不过没有“赶紧扔掉”,反而兴致勃勃地加入了炒股大军。

但我和父亲关于股票的“争吵”随即展开。父亲反对搞股份制,“一搞股份制,股东就成了老板,工人阶级都成了打工仔,这像话吗?”嘴上愤愤不平,可我想买股票,父亲还是早早地起床叫醒我,让我去排队。1991年股价放开前,要买到

股票如同博彩,必须天不亮就去证券公司门口排队拿号,拿了编号经过两三次点名,才能领取委托单,委托进去就石沉大海,一天也没成交易,彼此有些陌生和隔阂。父亲性格固执,上世纪80年代商业开放,他蔑视为投机倒把,直到商品丰富了,买东西也不用凭啥票了,才肯承认商业开放是好事。对股票,他开始也固执地认为与彩票没啥区别,那是赌博。当时我对股票也一窍不通,不过没有“赶紧扔掉”,反而兴致勃勃地加入了炒股大军。

但我和父亲关于股票的“争吵”随即展开。父亲反对搞股份制,“一搞股份制,股东就成了老板,工人阶级都成了打工仔,这像话吗?”嘴上愤愤不平,可我想买股票,父亲还是早早地起床叫醒我,让我去排队。1991年股价放开前,要买到

股票如同博彩,必须天不亮就去证券公司门口排队拿号,拿了编号经过两三次点名,才能领取委托单,委托进去就石沉大海,一天也没成交易,彼此有些陌生和隔阂。父亲性格固执,上世纪80年代商业开放,他蔑视为投机倒把,直到商品丰富了,买东西也不用凭啥票了,才肯承认商业开放是好事。对股票,他开始也固执地认为与彩票没啥区别,那是赌博。当时我对股票也一窍不通,不过没有“赶紧扔掉”,反而兴致勃勃地加入了炒股大军。

但我和父亲关于股票的“争吵”随即展开。父亲反对搞股份制,“一搞股份制,股东就成了老板,工人阶级都成了打工仔,这像话吗?”嘴上愤愤不平,可我想买股票,父亲还是早早地起床叫醒我,让我去排队。1991年股价放开前,要买到

股票如同博彩,必须天不亮就去证券公司门口排队拿号,拿了编号经过两三次点名,才能领取委托单,委托进去就石沉大海,一天也没成交易,彼此有些陌生和隔阂。父亲性格固执,上世纪80年代商业开放,他蔑视为投机倒把,直到商品丰富了,买东西也不用凭啥票了,才肯承认商业开放是好事。对股票,他开始也固执地认为与彩票没啥区别,那是赌博。当时我对股票也一窍不通,不过没有“赶紧扔掉”,反而兴致勃勃地加入了炒股大军。

但我和父亲关于股票的“争吵”随即展开。父亲反对搞股份制,“一搞股份制,股东就成了老板,工人阶级都成了打工仔,这像话吗?”嘴上愤愤不平,可我想买股票,父亲还是早早地起床叫醒我,让我去排队。1991年股价放开前,要买到

股票如同博彩,必须天不亮就去证券公司门口排队拿号,拿了编号经过两三次点名,才能领取委托单,委托进去就石沉大海,一天也没成交易,彼此有些陌生和隔阂。父亲性格固执,上世纪80年代商业开放,他蔑视为投机倒把,直到商品丰富了,买东西也不用凭啥票了,才肯承认商业开放是好事。对股票,他开始也固执地认为与彩票没啥区别,那是赌博。当时我对股票也一窍不通,不过没有“赶紧扔掉”,反而兴致勃勃地加入了炒股大军。

但我和父亲关于股票的“争吵”随即展开。父亲反对搞股份制,“一搞股份制,股东就成了老板,工人阶级都成了打工仔,这像话吗?”嘴上愤愤不平,可我想买股票,父亲还是早早地起床叫醒我,让我去排队。1991年股价放开前,要买到

股票如同博彩,必须天不亮就去证券公司门口排队拿号,拿了编号经过两三次点名,才能领取委托单,委托进去就石沉大海,一天也没成交易,彼此有些陌生和隔阂。父亲性格固执,上世纪80年代商业开放,他蔑视为投机倒把,直到商品丰富了,买东西也不用凭啥票了,才肯承认商业开放是好事。对股票,他开始也固执地认为与彩票没啥区别,那是赌博。当时我对股票也一窍不通,不过没有“赶紧扔掉”,反而兴致勃勃地加入了炒股大军。

但我和父亲关于股票的“争吵”随即展开。父亲反对搞股份制,“一搞股份制,股东就成了老板,工人阶级都成了打工仔,这像话吗?”嘴上愤愤不平,可我想买股票,父亲还是早早地起床叫醒我,让我去排队。1991年股价放开前,要买到

股票如同博彩,必须天不亮就去证券公司门口排队拿号,拿了编号经过两三次点名,才能领取委托单,委托进去就石沉大海,一天也没成交易,彼此有些陌生和隔阂。父亲性格固执,上世纪80年代商业开放,他蔑视为投机倒把,直到商品丰富了,买东西也不用凭啥票了,才肯承认商业开放是好事。对股票,他开始也固执地认为与彩票没啥区别,那是赌博。当时我对股票也一窍不通,不过没有“赶紧扔掉”,反而兴致勃勃地加入了炒股大军。

但我和父亲关于股票的“争吵”随即展开。父亲反对搞股份制,“一搞股份制,股东就成了老板,工人阶级都成了打工仔,这像话吗?”嘴上愤愤不平,可我想买股票,父亲还是早早地起床叫醒我,让我去排队。1991年股价放开前,要买到

股票如同博彩,必须天不亮就去证券公司门口排队拿号,拿了编号经过两三次点名,才能领取委托单,委托进去就石沉大海,一天也没成交易,彼此有些陌生和隔阂。父亲性格固执,上世纪80年代商业开放,他蔑视为投机倒把,直到商品丰富了,买东西也不用凭啥票了,才肯承认商业开放是好事。对股票,他开始也固执地认为与彩票没啥区别,那是赌博。当时我对股票也一窍不通,不过没有“赶紧扔掉”,反而兴致勃勃地加入了炒股大军。

但我和父亲关于股票的“争吵”随即展开。父亲反对搞股份制,“一搞股份制,股东就成了老板,工人阶级都成了打工仔,这像话吗?”嘴上愤愤不平,可我想买股票,父亲还是早早地起床叫醒我,让我去排队。1991年股价放开前,要买到

股票如同博彩,必须天不亮就去证券公司门口排队拿号,拿了编号经过两三次点名,才能领取委托单,委托进去就石沉大海,一天也没成交易,彼此有些陌生和隔阂。父亲性格固执,上世纪80年代商业开放,他蔑视为投机倒把,直到商品丰富了,买东西也不用凭啥票了,才肯承认商业开放是好事。对股票,他开始也固执地认为与彩票没啥区别,那是赌博。当时我对股票也一窍不通,不过没有“赶紧扔掉”,反而兴致勃勃地加入了炒股大军。

但我和父亲关于股票的“争吵”随即展开。父亲反对搞股份制,“一搞股份制,股东就成了老板,工人阶级都成了打工仔,这像话吗?”嘴上愤愤不平,可我想买股票,父亲还是早早地起床叫醒我,让我去排队。1991年股价放开前,要买到

股票如同博彩,必须天不亮就去证券公司门口排队拿号,拿了编号经过两三次点名,才能领取委托单,委托进去就石沉大海,一天也没成交易,彼此有些陌生和隔阂。父亲性格固执,上世纪80年代商业开放,他蔑视为投机倒把,直到商品丰富了,买东西也不用凭啥票了,才肯承认商业开放是好事。对股票,他开始也固执地认为与彩票没啥区别,那是赌博。当时我对股票也一窍不通,不过没有“赶紧扔掉”,反而兴致勃勃地加入了炒股大军。

但我和父亲关于股票的“争吵”随即展开。父亲反对搞股份制,“一搞股份制,股东就成了老板,工人阶级都成了打工仔,这像话吗?”嘴上愤愤不平,可我想买股票,父亲还是早早地起床叫醒我,让我去排队。1991年股价放开前,要买到

股票如同博彩,必须天不亮就去证券公司门口排队拿号,拿了编号经过两三次点名,才能领取委托单,委托进去就石沉大海,一天也没成交易,彼此有些陌生和隔阂。父亲性格固执,上世纪80年代商业开放,他蔑视为投机倒把,直到商品丰富了,买东西也不用凭啥票了,才肯承认商业开放是好事。对股票,他开始也固执地认为与彩票没啥区别,那是赌博。当时我对股票也一窍不通,不过没有“赶紧扔掉”,反而兴致勃勃地加入了炒股大军。

但我和父亲关于股票的“争吵”随即展开。父亲反对搞股份制,“一搞股份制,股东就成了老板,工人阶级都成了打工仔,这像话吗?”嘴上愤愤不平,可我想买股票,父亲还是早早地起床叫醒我,让我去排队。1991年股价放开前,要买到

股票如同博彩,必须天不亮就去证券公司门口排队拿号,拿了编号经过两三次点名,才能领取委托单,委托进去就石沉大海,一天也没成交易,彼此有些陌生和隔阂。父亲性格固执,上世纪80年代商业开放,他蔑视为投机倒把,直到商品丰富了,买东西也不用凭啥票了,才肯承认商业开放是好事。对股票,他开始也固执地认为与彩票没啥区别,那是赌博。当时我对股票也一窍不通,不过没有“赶紧扔掉”,反而兴致勃勃地加入了炒股大军。

但我和父亲关于股票的“争吵”随即展开。父亲反对搞股份制,“一搞股份制,股东就成了老板,工人阶级都成了打工仔,这像话吗?”嘴上愤愤不平,可我想买股票,父亲还是早早地起床叫醒我,让我去排队。1991年股价放开前,要买到

股票如同博彩,必须天不亮就去证券公司门口排队拿号,拿了编号经过两三次点名,才能领取委托单,委托进去就石沉大海,一天也没成交易,彼此有些陌生和隔阂。父亲性格固执,上世纪80年代商业开放,他蔑视为投机倒把,直到商品丰富了,买东西也不用凭啥票了,才肯承认商业开放是好事。对股票,他开始也固执地认为与彩票没啥区别,那是赌博。当时我对股票也一窍不通,不过没有“赶紧扔掉”,反而兴致勃勃地加入了炒股大军。

但我和父亲关于股票的“争吵”随即展开。父亲反对搞股份制,“一搞股份制,股东就成了老板,工人阶级都成了打工仔,这像话吗?”嘴上愤愤不平,可我想买股票,父亲还是早早地起床叫醒我,让我去排队。1991年股价放开前,要买到

股票如同博彩,必须天不亮就去证券公司门口排队拿号,拿了编号经过两三次点名,才能领取委托单,委托进去就石沉大海,一天也没成交易,彼此有些陌生和隔阂。父亲性格固执,上世纪80年代商业开放,他蔑视为投机倒把,直到商品丰富了,买东西也不用凭啥票了,才肯承认商业开放是好事。对股票,他开始也固执地认为与彩票没啥区别,那是赌博。当时我对股票也一窍不通,不过没有“赶紧扔掉”,反而兴致勃勃地加入了炒股大军。

但我和父亲关于股票的“争吵”随即展开。父亲反对搞股份制,“一搞股份制,股东就成了老板,工人阶级都成了打工仔,这像话吗?”嘴上愤愤不平,可我想买股票,父亲还是早早地起床叫醒我,让我去排队。1991年股价放开前,要买到

股票如同博彩,必须天不亮就去证券公司门口排队拿号,拿了编号经过两三次点名,才能领取委托单,委托进去就石沉大海,一天也没成交易,彼此有些陌生和隔阂。父亲性格固执,上世纪80年代商业开放,他蔑视为投机倒把,直到商品丰富了,买东西也不用凭啥票了,才肯承认商业开放是好事。对股票,他开始也固执地认为与彩票没啥区别,那是赌博。当时我对股票也一窍不通,不过没有“赶紧扔掉”,反而兴致勃勃地加入了炒股大军。

但我和父亲关于股票的“争吵”随即展开。父亲反对搞股份制,“一搞股份制,股东就成了老板,工人阶级都成了打工仔,这像话吗?”嘴上愤愤不平,可我想买股票,父亲还是早早地起床叫醒我,让我去排队。1991年股价放开前,要买到

股票如同博彩,必须天不亮就去证券公司门口排队拿号,拿了编号经过两三次点名,才能领取委托单,委托进去就石沉大海,一天也没成交易,彼此有些陌生和隔阂。父亲性格固执,上世纪80年代商业开放,他蔑视为投机倒把,直到商品丰富了,买东西也不用凭啥票了,才肯承认商业开放是好事。对股票,他开始也固执地认为与彩票没啥区别,那是赌博。当时我对股票也一窍不通,不过没有“赶紧扔掉”,反而兴致勃勃地加入了炒股大军。

但我和父亲关于股票的“争吵”随即展开。父亲反对搞股份制,“一搞股份制,股东就成了老板,工人阶级都成了打工仔,这像话吗?”嘴上愤愤不平,可我想买股票,父亲还是早早地起床叫醒我,让我去排队。1991年股价放开前,要买到

股票如同博彩,必须天不亮就去证券公司门口排队拿号,拿了编号经过两三次点名,才能领取委托单,委托进去就石沉大海,一天也没成交易,彼此有些陌生和隔阂。父亲性格固执,上世纪80年代商业开放,他蔑视为投机倒把,直到商品丰富了,买东西也不用凭啥票了,才肯承认商业开放是好事。对股票,他开始也固执地认为与彩票没啥区别,那是赌博。当时我对股票也一窍不通,不过没有“赶紧扔掉”,反而兴致勃勃地加入了炒股大军。

但我和父亲关于股票的“争吵”随即展开。父亲反对搞股份制,“一搞股份制,股东就成了老板,工人阶级都成了打工仔,这像话吗?”嘴上愤愤不平,可我想买股票,父亲还是早早地起床叫醒我,让我去排队。1991年股价放开前,要买到

股票如同博彩,必须天不亮就去证券公司门口排队拿号,拿了编号经过两三次点名,才能领取委托单,委托进去就石沉大海,一天也没成交易,彼此有些陌生和隔阂。父亲性格固执,上世纪80年代商业开放,他蔑视为投机倒把,直到商品丰富了,买东西也不用凭啥票了,才肯承认商业开放是好事。对股票,他开始也固执地认为与彩票没啥区别,那是赌博。当时我对股票也一窍不通,不过没有“赶紧扔掉”,反而兴致勃勃地加入了炒股大军。

但我和父亲关于股票的“争吵”随即展开。父亲反对搞股份制,“一搞股份制,股东就成了老板,工人阶级都成了打工仔,这像话吗?”嘴上愤愤不平,可我想买股票,父亲还是早早地起床叫醒我,让我去排队。1991年股价放开前,要买到